

第一章 导言

作为汉族中一支重要而且特殊的民系——客家人，乃是一个极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集群。几千年来，他们从中原向外逐步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和海外各地。对国内外的文化、经济交流以及民族交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书探讨的主题即是我国传统社会晚期客家人向内陆大西南迁徙扎根奋斗的史迹。通过对清

代四川的闽粤客家人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再现在清代前期四川社会经济的重建过程中，客家人移居四川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则可揭示清代客家人口迁移乃至传统社会晚期我国人口迁移的若干特点。

一、学术史回顾

客家人引起世人的注意和研究，至迟在上世纪初即已开始。在 1949 年以前的近一个半世纪中，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贡献是甄别客家人的种族血统的渊源，从客家的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入手，证实了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支重要民系。最早述及客家源流变革及语言习俗的人当推 1808 年在广东惠州丰湖书院讲学的徐旭曾，其言后收入《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①。这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客家问题处于无人问津的“真空”阶段。

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客家人因几次大的历史事件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是 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要首领和基本力量均由两广的客家人组成；二是 1856 年广东西路六邑（高要、高明、鹤山、恩平、开平、新宁）发生了长达 12 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②；三是某些教科书上误把客家人当作非汉族系统，而引起客家人士的极大不满，于是纷纷成

参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湾版 民国 70 年（1981 年）9 月重印。

参见陈碧池：《海隅纪略》赖际熙：《赤溪县志》卷 8《附编·开县事纪》。

教科书事件主要有：1905 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广东乡土历史》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

192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版《世界地理》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1930 年 7 月，广东省建设厅《建设周报》第 37 期载文曰：“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

立诸如客家源流研究会、客族源流调查会、客系大同会等研究团体，阐述客家源流、追溯客家与中原汉族的渊源关系。这三大事件对客家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专著都相当多^①，其中侧重于客家方言撰述的著作就有：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杨恭桓《客话本字》、章太炎《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和罗蔼其《客方言》等。这批著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证实了客家人的方言、习俗明显地保留了“中州之遗”^②，客家人是地道的中原汉人后裔。此时期的专著还有古直编著的《客人三先生诗选》、《客人骈文选》和《客人对》赖际熙等人编纂的《崇正同人系谱》，此书实即客家系谱，包括客家的源流、语言、礼俗、选举、人物、艺文等等，是研究客家的极重要参考书目之一。这一时期的客家问题研究集大成者当首推罗香林大师于 1933 年 11 月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该书从客家研究的发端、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文教、特性以及客家与近代中国、客家的一般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客家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遗憾的是该书对客家的经济、社会组织却无专题论述。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专著还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正、补充，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客家研究的指导性论著，是目前国内外有志于研究客家的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它的问世，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罗香林大师也因此被誉为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这一时期，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对客家人的研究也有不少的建树。罗香林大师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不赘述。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有关广东地区客家民俗、歌谣、传说的书^③。

参阅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客方言·章太炎序》民国 11 年（1922 年）版。

参阅《客家研究导论》，台湾版，民国 70 年（1981 年）9 月重印。

这一时期，客家研究在地域上除注重粤东外，已涉及到福建、广西、四川、江西等客家居住地。

1949年以后至1980年的30年间，客家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有关客家方面的研究论文、专著几乎是空白。只有极少数语言学著作中偶尔提到客家方言。如1956年王力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即有《客家话》一节。不过，这一时期的港台学者对客家研究仍坚持不懈，主要专著有1950年罗香林大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该书基本上是对《客家研究导论》的浓缩与升华。1965年罗香林先生又出版了《客家史料汇编》第一册，为客家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宝贵而又丰富的资料。1978年台湾学者陈运栋出版了《客家人》一书，该书见解基本上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次大综合。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专辟了《客家东移台湾的路线及其分布》一节，这是以前所未有过的。

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客家问题再度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在国内成立了一批客家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深圳教育学院客家方言研究中心、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北京客家联谊会、梅州客家联谊会等，使客家研究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不少有关客家资料或研究的专门性刊物创办了，如广东嘉应民俗学会的《客家民俗》期刊，上海华东师大的《客家学研究》期刊，梅州报社的《客家风采》辑刊等。此外，1989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客家研究》第一集，收录了有关客家源流、文化、民俗、人物以及客家人在海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或资料。公开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1991年河

参阅《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再版。

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佐泉先生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该书堪称是建国以来，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客家研究专著。该书除对客家起源、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外，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也作了详尽的介绍。但该书注重的仍是客家源流与客家文化，没有完全走出前人对客家研究的框架。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黄伟经主编的《客家名人录》一书，首次采用传记体裁辑录了梅州地区近现代约200位历史名人。199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房学嘉先生《客家源流探奥》一书。该书认为，客家人是古百越族里的一支与历史上少数移居客家地区之中原流人混化后而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且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是古百越遗民。他论定客家之根在今日之客家地区，这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客家之根在北方之论，大为不同。此见解对客家源流以及客家诸问题之研究，无疑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陈支平博士《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①一文，认为客家人的历史源流，相当复杂，而非罗香林先生认为的客家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陈博士通过大量史料举证了“原为非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山区后而成为客家人”的事实。作者还认为“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客家源流与陈元光率兵南戍没有关系的论点，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李默在《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②一文中认为，汉末至六朝南渡汉族在闽粤赣边居住，在汀州地区孕育了有共同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的群体，唐开元始有“客”名，宋已有“客语”方言，明正德“客家”作为汉族一支民系始告形成。“客家民系的形成

①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② 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

过程，也就是融合土著的过程”。这些被融合的土著民族包括畚人、瑶人、僚人、蛋人等大量的百越族裔。以上两文对罗香林先生的客家形成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张卫东、刘丽川的《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①一文，对流行的客家分布地、客家人口数以及客家称谓由来等观点，大胆发问，认为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检讨这些问题。并强调“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土族”，对于客家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南来的中原土族及其后裔确实构成客家先民的主体并起着主导作用”。曾维才在《谈谈先于客家民系生活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土著居民的成分》^②一文认为在客家民系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之前，此地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相对于客家民系而言的土著，至少应该包括畚族、汉族（非客家民系）等民族（民系）。林嘉书《从文化角度谈谈客家方言研究》^③认为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并非独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母体之上，决定于客家民系的人这个活的物质与人所立足生存的土地。“中华民族之社会历史大文化背景与客家民系的人和自然地理实际的相结合，特别是与低水平生产力、低层次平面垦殖农耕稻作文明以及血缘姓氏村社的结合，为客家方言土语提供了极好的延传条件”。吴泽在其《建立客家学刍议》^④一文中呼吁在我国应尽快建立客家学。他说“全面地吸收近百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关客家问题研究的成果，科学地构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研究范畴，总结客家学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文化界一项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客家学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它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是一个庞大而

载《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④}载《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对各地区客家人的个别的，具体的研究，然后再把这具体的、个别的结论加以提炼、抽绎，上升为对客家民系总体特征的认识。这样，也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是科学的、有价值的。笔者真诚地盼望客家学能在我国早日建立，也希望这部拙作能为客家学的建立出一点绵力。

近年来，台湾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出力不菲，问世的著作有：1982年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1985年雨青《客家人寻根》、1989年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1991年钟孝上《客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91年陈运栋《台湾的客家礼俗》等。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客家族群的迁徙与形成方面，重点是论证客家人的种族血统渊源，而对整个族群的社会经济生活论证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则主要集中在国内客家地区，尤其集中在粤东客家地区，对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客家人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即便如此，上述的研究成果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个别性和辩论性的研究阶段，尚未上升到系统的理论构建阶段，而对客家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基层社会组织等却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

本书主要是从移民史的角度研究清代四川的闽粤客家移民，因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学术界对清代移民史的研究状况。在清代的历次移民运动中，尤以向东北、台湾和四川三地区移民规模最为宏大。因而学术界向来对这三大地区也相当重视。其中对东北和台湾移民史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已出版的专著也较多。

在东北移民史研究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李德滨、石方的《黑龙江移民概要》^①，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

^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解放前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史要，其中专辟《清代黑龙江地区移民》一章，从移民的类型、原因、历史作用等方面详论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移民概况。认为清王朝统治的 260 余年是黑龙江地区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移民的进入。黑龙江移民的类型主要有流人、流民、垦民。关于移民的原因，作者指出：移民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体可归为自然与社会两大类，其中经济原因是经常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口迁移的规律，归根结蒂是受经济规律制约的。田方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略》^①一书第五章的“清代移民史”主要也是讲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移民活动。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②一书则对清初东北地区的流人来源及其对东北的开发，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台湾移民史的研究比较深入，涉及面也广，包括移民渡台的背景、移民与土著的社会整合、移民在台湾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以及移民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庄德金在《清初严禁沿海人民偷渡来台始末》^③一文中认为，清初闽粤人渡台为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压力所致，人们出于谋生与趋利的目的，不顾政府禁令而偷渡到土地肥沃的台湾。陈其南的《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④一书，利用社会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台湾移民土著化模式。认为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模式是土著化，即来台汉人由移民社会走向“土著化”，变为土著社会。结果是移民不再一味以大陆祖籍为指涉标准，而以现居的聚落组织为其主要生活单位。划分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的标准是社会群体构成的认同意识。李国祁在《清代台

知识出版社，1986年6月版。

台湾开明书店，民国58年（1969年）再版。

《台湾文献》第15卷，第3—4期，民国53年（1964年）版。

台湾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年3月版。

湾社会的转型》^①一文中则提出与陈其南相反的理论模式——内地化。他认为清代台湾发展的趋向是内地化，即台湾的社会变迁在取向上是以中国本部各省的社会形态为目标，转变成与中国本部完全相同的社会。其结果是台湾成为中华的文治社会，中国文化彻底在此生根。大陆学者陈孔立则在其《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②一书中，通过对土著化和内地化两种模式的比较讨论，将台湾的移民社会发展模式归结为“定居化”即居民由以移民为主转变为以移民的后裔为主，社会结构由以不同祖籍的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宗族关系为主，有许多方面与大陆社会更加接近，也有一些方面更加体现出台湾本地的特点，移民社会的发展是双向型的。由此可见，台湾移民史研究的理论性已日益明显。

张胜彦的《台湾史研究》^③一书和黄富三《清代台湾之移民的耕地取得问题及其对土著的影响》^④一文都对清代移民在台湾取得土地的方式及其同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汪茂和《清代台湾的经济开发》^⑤一文，认为清前期大批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入台，成为台湾开发的主力军。至乾隆年间，台湾的米粮、糖业均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进而也带动了台湾商业的发展。蔡渊洁在《清代台湾的移垦社会》^⑥一文中则指出：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由于受闽南粤东原有重商趋利传统的影响，经济取向更为浓厚。这种传统一直影响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促使台湾土地不断被开拓，自然资源不断被发掘利用，进而带动台湾经济的急速扩张。尹章义的《闽粤移

《台湾史研讨会记录》，民国 67 年（1978 年）6 月版。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台湾华世出版社，民国 70 年（1981 年）版。

① 《食货月刊》复刊第 11 卷第 2 期，民国 70 年（1981 年）版。

② 《南开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③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之 16》民国 75 年（1986 年）6 月版。

民的协和与对立——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与新庄三山国王庙的兴衰史》^①一文，从台湾的闽粤移民在开发台北平原的过程中，从容忍相安到矛盾、冲突、对立的过程，揭示了移民的社会整合过程。戴炎辉在《清代台湾之乡治》^②一书中，全面地考察了台湾移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庄的形成和实际运作程序，并讨论了台湾的垦隘、保甲、团练及清庄联甲等各基层组织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许文雄在《清代台湾边疆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乱》^③一文中认为：台湾社团最初是由地理背景以及个人利益相同的拓荒者构成，其目的是为了相互援助和促进宗教信仰。由于这些组织在移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关联机制的作用，它们为了各种合法与非法的目的动员起来采取行动，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林衡道的《台湾农村寺庙分布情形之调查——漳泉移民村落与粤东移民村落寺庙之比较》^④一文，则对全台湾的农村寺庙作了初步的统计和比较，认为粤东移民在村落的寺庙及其信仰上多保留其在大陆的特色，很少接受台湾漳泉移民的影响；漳泉移民村落寺庙的祀神以地方性神佛为主，且有接受广东移民祀神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有关台湾移民史研究专著还有：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⑤、《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⑥，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⑦、杨熙《清代台湾政策与社会变迁》^⑧以及廖风德《清代之璊玛兰——一个台湾史的区域研究》^⑨

《台北文献》第 74 期，民国 74 年（1985 年）。

台湾联经出版社，民国 68 年（1979 年）版。

《台湾研究集刊》，1988 年第 1 期。

① 《台湾文献》第 13 卷第 3 期，民国 51 年（1962 年）版。

⑤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 78 年（1989 年）版。

⑥ 台湾其宗印刷有限公司，民国 72 年（1983 年）版。

⑦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 70 年（1981 年）版。

⑧ 台湾天工书局，民国 72 年（1983 年）版。

⑨ 台湾里仁书局，民国 71 年（1982 年）版。

等。有关论文更是难以计数，此处从略。

与东北和台湾相比，清代四川移民史的研究则较为薄弱。1932年谭其骧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①一文中涉略到四川移民。指出：“湖南在清初以前是为接受移民地域，在清初以后是为输出移民地域”。清初两湖人大举入川是“以经济原因而外徙也”。最早对清代四川移民史进行研究的是顾颉刚和黎光明，他们于1934年发表了《明末清初之四川》^②一文，指出明末清初的四川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明末张献忠的“屠川”，二是清初的招民入川。屠川造成了四川的地广人稀，而清初的招民政策则使四川人口迅速增长。1943年钟禄元发表《东山客族风俗一瞥》^③一文，这是较早开始关注四川地区客家移民之作。该文简略地介绍了成都东山一带的“土广东”历史与现状。1949年罗尔纲发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④一文，在谈到“国内移民”时，他指出“直省内部移民，以移民入四川为最多”。四川接受外省大量移民乃康熙末年事，嘉道时渐趋停止。人口压迫为当时湖广等省人入川的最大动力，四川因明末战争变得地广人稀，故能容纳大量外省人口。这一时期，对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

20世纪50至70年代，对四川移民史的研究是与对农民战争史，特别是与张献忠起义的研究相伴而行的。1956年万大斌《谈谈清初所谓“湖广填四川”的问题》^⑤一文，认为用“张献忠剿四川”来作为四川移民的原因是毫无根据的。四川

今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风土杂志》，1943年8月创刊号。

④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1月。

⑤ 《教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7期；

地广人稀是明清统治者在四川的长期战争造成的。1979年王纲的《“湖广填四川”问题探讨》^①一文也认为：把“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看成是张献忠农民军“屠蜀”所为，“纯属无稽之谈”。湖广向四川的移民活动属于历史上战乱之后正常的人口流动，只不过清初的移民规模最大、最突出而已。他将移民分为随军、开荒、避赋、逃荒和从事工商业活动等五种情况，并强调移民入川对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年，胡昭曦的《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②一文发表，指出“湖广填四川”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国内大规模移民活动。作者用大量史料论证末清初满汉统治者在四川激烈争战而给当地带来的深重灾难。还根据部分族谱、碑刻、方志及传记资料对清代入籍四川的各省人民进行考察。这一时期，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有谢忠梁的《二千年间四川人口概况》^③，该文认为四川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是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全川共约9万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四川才能接纳湖北、湖南、广东、江西和福建等省的大量移民。外省人大量入川垦荒活动，到乾隆末年基本停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日趋活跃。清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移民入川密不可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射到清代四川移民的原因、过程、入川后的发展及对四川的影响等方面。

1984年彭雨新发表《四川清初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④一文。认为清初政府对四川的首要政策就是增加人口、招徕各省民人入川。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宽缓政策，轻

①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 1979年第3期。

② 《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季刊》1979年第1期, 后改为《张献忠屠蜀考辨》一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1978年第3期。

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赋政策便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四川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清初招民和轻赋政策相结合所带来的结果。1986年郭松义《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①，认为清初四川人烟稀少，康熙时特别颁布招垦条例，实行种种优惠政策，从而吸引了两湖及闽粤等大批农民入川开垦。“迁居者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往往都是整个家庭，或者与至亲密戚结伴而行”。钟禄元经过再次研究，认为成都东山一带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省的梅县、五华、和平、兴宁、大埔、龙川和连平等地^②。1987年田光炜在其《“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过程》^③一文中提出“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其上限为顺治十六年，四川的移民运动一直绵延到同治以后，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高潮在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年间。是年，鲍晓娜在《清代前期四川地区的田赋》^④一文中，通过对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四川与全国其他省的田赋比较研究指出：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在全国各省中，四川的赋额几乎是最低的。王纲《顺康雍乾时期的治蜀方针》^⑤认为：清前期的治蜀方针经历了“安民”“裕民”“便民”三个阶段，措施较为得力，大大推动了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个西南经济、政治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很快在四川建立起来。

清代四川移民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这方面，郭松义的《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⑥一文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四川的情况比较独特。大量外省客民涌入四川，成为当

① 《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

② 《成都东山客家人》载《成都文物》，1986年第3期。

《四川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④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⑤ 白寿彝主编：《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⑥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时垦荒大军中的主导力量，这是任何其他省份所未曾出现的。客民入川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四川的田土不断得到垦辟，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四川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逐步提高。同时，随着客民大批入川，在荒芜土地上重建四川社会，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得以大批涌现。拙作《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经济活动》^①一文，专门论述了广东移民在四川的山区开发、土壤改良以及新作物引进和推广方面，对四川农业生产整体发展所作的贡献，还探讨了广东移民的工商业活动情况。林顿的《清代四川商业贸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②、高王凌的《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③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④等文章，分别从清代四川的商业、农业等方面反映了外省移民对四川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⑤一文认为，清代四川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量人口自由迁川运动，对恢复四川经济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清代前期，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粮食不仅足够本省食用，且可大量出口。嘉庆以后，四川人口仍持续上升，但耕地面积却徘徊不前，农业生产技术已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四川人口压力之格局形成。彭雨新《清代四川和东三省土地开垦中劳动力的调动》^⑥也指出：清代劳动力移动频繁，其中规模特大、影响特深的，在前期有四川的开垦，在末代则有东三省的开发。在土地开垦中，自耕农居于绝对重要的地位。康雍乾时期是四川自耕农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② 《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清史究集》第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⑥ 《平准学刊》第一辑。

⑤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4期。

建立私有经济的黄金时代。袁庭栋在《巴蜀文化》^①一书中，也认为清代大量外省人入川，必然将各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四川，从而推动了四川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冉光荣在《清前期重庆地区的帮会》^②一文中，对重庆地区的各类帮会组织进行了研究，认为重庆的外籍商人成了工商业界的主宰力量，由湖广、江西、江南、山西、陕西、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商人联合组成的“八省客长”在重庆拥有广泛的权利，几乎操纵着所有的牙行。

四川移民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③一文将四川境内的会馆称为“移民会馆”，认为四川境内除成都、重庆外，其他地区的会馆只能是由农民创建的。而这些农民又大多是各省入川的客民。这种会馆并非工商行会，而是移民联络乡情的一种组织形式。黄友良的《从“湖广填四川”谈四川的会馆》^④也将四川会馆的性质定为“客民型”，即为他省入川客民所建，这与通都大邑中工商性质的会馆迥然不同。四川会馆密度之高，举国无二。会馆实为研究清代华南移民最系统的“索引”。拙作《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⑤一文，认为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数量达 200 所以上，分布在四川的 85 个府州厅县之中。会馆所在之处即是广东移民落籍的物证。文中还讨论了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会馆在移民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同籍范围内的人们凝聚力，另一方面也给四川移民社会的融合同化过程带来了割裂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1987年深圳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④ 《文史杂志》1989年第1期。

⑤ 《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作用。但总的来看，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此外，李世平的《四川人口史》^①也颇值得注意。在谈到清代四川的移民运动时，他认为四川大规模移民活动在康熙末年已成尾声，雍正五年正式停止。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前后延续六十余年，始终由政府鼓励和组织，是四川人口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最后也是由朝廷下令结束的。四川人口的迅速增长，与清代“湖广填四川”时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带来了适宜于丘陵山区种植的高产作物白薯有极大关系。白薯的广泛种植，使四川的生产面貌和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近年来，四川的闽粤客家人也渐为世人瞩目。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调查研究。霍瑞勇、黄廷华通过对四川省隆昌县新生乡光华村的调查发现，光华村是清代广东客家移民后裔的集中居住区，90%以上的人至今仍讲广东客家话^②。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称：今成都市郊青白江、龙泉和金牛等区的居民大多会操客家话和西南官话两种方言。黄先生还将四川的客家话与闽粤等地的客家话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崔荣昌在《四川方言的形成》^④一文中认为：四川的客家话即俗称的“广东话”。清朝康雍乾时期入川的广东客家人把他们的方言保留下来，在现在的四川方言中占第二位。其另一篇大作《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⑤一文，认为四川境内至今仍有30多个县市内有能操客家话的广东移民后裔。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参见《隆昌发现古代南北人口大迁徙新证》和《四川的“广东村”》，分别载《四川工人日报》1992年6月20日和广东《周末画报》1992年第23期。

③ 《方言》，1986年第2期。

④ 《方言》，1985年第1期。

⑤ 《方言》，1986年第3期。

李世华、张建辉曾亲自到成都市郊的龙潭寺乡采访，发现龙潭寺乡内的 4 万人都会讲“土广东话”其中 90% 以上属客家人，他们的民俗与当地蜀人不同^①。

港台及海外学者在四川移民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②一书中谈到闽粤等地“客家人”西迁四川时指出：“清康熙五十年，清廷以其地长久荒芜，乃令附近各省农民入川耕种。‘客民，闻讯即裹资西进，是为‘西进线’；东南方面，又因为台湾草昧待理，闽粤‘客民’乘机渡海，是为‘南进线’”。吕实强的《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发生的影响》^③一文则提出：川省居民十之八九均为清初以后陆续由外省迁入及其所繁衍。清代移民入川，特别是在康雍乾时期，多在政府政策性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移民方式为由原籍同族或乡亲组合集体而来。入川之后，移民间因习俗不同而经历了“由分离而融合”的过程，会馆性质的演变即为例证。香港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④一书中将客家人的迁移分为五次，其中清初的闽粤客家人迁居四川属于第四次大迁徙。他认为迁川客民大多是康熙末年自广东惠州、嘉应州等地搬去的客家农民。他们入川后分居于四川的部分地区。香港的全汉升和美国的王业键在《清代的人口变动》^⑤一文中认为：清代的人口移动在空间方面有三大趋向：一为移民入川，二为移民东北，三为移民台湾和南洋群

《东山客家场——龙潭寺》载《成都晚报》1988年6月10日。

台湾版，民国67年（1978年）。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

① 该文1950年第一次发表于《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0月再版。罗先生的观点，基本上为后继学者特别是港台学者所承继。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61年。